

论北方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大系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 乌 恩

回眸中华 5 千年文化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博大的中华文化犹如浩瀚的海洋,是汇集万泉、海纳百川而形成的。她既蕴含了勤劳质朴的黄河文化,也包含着机敏睿智的长江文化,还容纳了豪放坦荡的北方草原文化……这些文化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其个性特征,它们始终是在碰撞—融合—再碰撞—再融合的互动过程中发展的。每一种文化都对中华文化的丰富、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北方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影响进行分析和阐述。

北方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 同属中华文化的古老源头

长期以来,由于多种原因,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草原往往是与愚

昧、野蛮和原始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如果我们放弃陈旧的思维模式,客观地审视史料,冷静地观察文物考古成果,用科学的态度从现象到本质综合反思历史,就会得出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北方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大系中悠久而古老的文化类型之一,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共同组成中华文化的三大源头。

考古发现证明,远古时期的北方草原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该地域从公元前 6000—公元前 2000 年,先后孕育了原始农耕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阿善文化、朱开沟下层文化等)和游牧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朱开沟中上层文化等)两个文化系列。其灿烂的文化成果表明,北方草原文化的总体发展水平与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是同步的。

据考古学和气象学的研究,我国北方草原地区“从(距今)4300(年)前后开始,受气候的影响,原始农业开始衰退,大规模的畜牧业——游牧经济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发生了从农业文化向牧业文化转变的过程”^①。随后,一种新型的文化——游牧文化在草原上诞生并逐渐壮大,成为此后 4000 余年间北方草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

文献记载也显示,北方草原文化至少在商周时期就已具备雏形,突出的标志就是当时的中原农耕民族已经观察到北方草原生活着与自己生产、生活习俗显著不同的族群。《礼记·王制》中说:“北方曰‘狄’,衣羽毛”;《左传》中记载了一位戎人的一段话:“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货币不通,言语不达”,《吕氏春秋》中说:“蛮夷反舌殊俗异习之国。其衣服、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淮南子》中说:“雁门之北,狄不火食”等等。这些记录、评价准确客观与否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草原民族最迟在商周时期已经形成了与中原农耕民族有显著差异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出了不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共同证明,草原民族的地域政权建立和金属

工具的发明使用——文明要素的形成——与中原地区是同步的。有迹象表明,部分北方游牧民族早在夏朝时期就已经完成了私有化进程。据《竹书纪年》记载:“帝癸即位,吠夷入于岐以叛。”吠夷是犬戎族的先民,一个“叛”字表明吠夷民族内部已经拥有等级社会组织。考古学界也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先民们似乎已建立了草原王国,其主人大致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山戎——东胡系。”^②到了商周——春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更加广大,不仅仅局限于蒙古高原地区,今天的山西中北部、东部,河北的南部,以及太行山山脉地区,都曾有戎狄活动,并且建立过很多局部政权。史载,西周末年的史伯对郑桓公说:“当成周时……北有卫、燕、鲜虞、潞、洛、泉、徐、蒲。”韦绍注:“狄,北狄也。鲜虞,姬姓在狄者也。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除卫、燕为周朝的分封诸侯之外,其余7个都是狄族的方国^③。早期的游牧政权曾给中原王朝带来很大的威胁,商朝统治者武丁联合周部落,历时3年才打败鬼方,说明鬼方族绝非乌合之众,已经成为有等级社会组织、颇具实力的区域政权。周建立后,从周武王开始到周穆王,对猃狁的战争从未间断。《诗经·小雅·采薇》中说:“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岂不日戒,猃狁孔棘。”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以掠夺为目的民族战争十分频繁、激烈,同时也证明此时的游牧民族已完全摆脱“蛮荒”状态,因为双方的战争已经超越了血缘复仇的范畴,“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城墙并非无敌: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④人们熟知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建立了北方草原上第一个游牧国家“行国”(百蛮大国),实际上匈奴人的统一是在过去的千百年游牧民族区域政权的基础之上建立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北方草原及周边区域是古代中国最早发明青铜器的地区之一。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间,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居民已经使用青

铜器了。考古学界的结论是：“内蒙古的青铜时代，以东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为前锋，在四千年前，它足以与同时代中原最发达的地区相媲美。这是一支土生土长的青铜文化。”^⑤“1976年，在赤峰市林西县大井村，发现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古铜矿遗址。这个铜矿包括开采、选矿、冶炼、铸造等全套工艺的遗迹，共发现矿坑40余个、炼炉8座，以及许多陶制鼓风管、陶范和炼渣，还有1000余件开采铜矿的工具，如石锤、石镐、铜凿等”^⑥。夏家店上层文化距今约3000—2000年，属游牧的东胡族文化。此外，考古学家在今天的山西西部黄河沿岸的保德、石楼、永和、平陆，以及汾河中游的忻县、灵石等地发掘了10多处商代遗址，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和玉石装饰品。其中青铜器既有商代的特点，同时又吸收了北方斯基泰文化的风格，学界推测是商代北疆少数民族所制^⑦。而举世瞩目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目前出土的最早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朱开沟墓葬中的，青铜短剑属商代早期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⑧。更以其独特的构图、精美的造型为世人所倾倒。上个世纪中后期，在鄂尔多斯的桃红巴拉、阿鲁柴登、西沟畔、玉隆太、毛庆沟等地陆续发现了大量以各种动物纹为装饰题材、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其畜牧业文化特征显著，呈现出与中原文化迥然有别的艺术魅力。

冶铁和铁器制作在北方草原也具有古老的历史。考古学界主张，蒙古高原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已进入铁器时代^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近在伊犁河谷的考古挖掘中，发现了公元前1000年的属于“古代草原民族”的铁制马镫、马衔等文物^⑩；到了公元前7世纪之后，铁制工具、武器已在蒙古高原及周边地区普及^⑪。20世纪前半叶，前苏联和蒙古国学者在伊沃勒加城（今俄罗斯乌兰乌德）遗址发掘中，“出土了铁片、铁刀、铁钉等铁器，并发现了炼铁时扔弃的铁渣，这是匈奴人有了炼铁业的物证。（考古学者）道尔吉苏荣认为，炼铁不能单靠一个人，故可以推断当时匈奴必有一批专门炼铁的手工业工匠，并且还有溶化铁

矿的高温炉子”。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西丰县汉乌桓墓中出土了大量铁制长剑,他们认为:“由剑柄的式样,至少可以说明这是他们(乌桓)自己锻造的而不是外来的。”^⑩

从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到4000年前后游牧业文化的诞生,从社会制度的演变到金属工具的发明使用,以及龙、凤、玉石文化等中华文化的关键要素在北方草原的出现,都足以说明北方草原在古老的时代就已摆脱了蛮荒时代,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脉络,其文明的进程与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不仅是同步的,在一些领域甚至是超前的(例如铁器的冶炼和使用)。据此,将北方草原文化视为中华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显然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北方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中华文化是一个多元的统一体,是中华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使各种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繁荣以及中西文化的交融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首先,北方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苍穹、草原、毡包、骏马、牧歌构成了一道奇丽的文化风景线,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生存模式和文化体系,展现了人类在不同自然条件下的非凡创造力,同时也为人们了解人类文化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提供了开阔的视野。

其次,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北方草原文化不仅从中原农耕文化中吸收和借鉴了诸多有益的内容,而且也以自身的价值观和特色文化,对中原农耕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物质文化方面,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极具胆识的“胡服骑射”举措,既改变了中原居民沿袭已久的着装习惯,也改变了商朝以来驾车作战

的军事传统,对未来中原民族的服饰演变、军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以上史实为世人所熟知,但事实上,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服饰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秦汉之后的古代中原服饰,基本上都可以视为北方民族服装的变体。根据服装史专家的研究,从战国到唐代,中原服饰经历了一场“胡化”过程,北方民族的裤褶(肥管裤)、襦裆(背心、坎肩)、半袖衫等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常服^⑩。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腰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南宋理学家朱熹也曾说过:“后世衣服,故未能猝复先世之旧,且得华夷稍有区别。今世之服,大抵皆为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属,先王冠服,扫地尽亦。自晋五胡之乱,后来随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北魏。”^⑪当然,北方民族对中原物质文化的影响显然并非仅限于服饰方面,当我们在古代汉文典籍中看到诸如胡瓜、胡麻、胡桃、胡荽、胡蒜以及胡笳、胡琴等等字眼时,自然也会联想起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影响。

在精神文化方面,草原文化对中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北朝时期以鲜卑为代表的北方民族对佛教十分虔诚,并投入了惊人的激情,由政府组织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的开发,为后世研究佛教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艺术宝库。唐朝的繁荣开放,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发展进程有关,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北方草原文化对唐朝上层建筑的影响,“胡风很浓”已成为大多数史学家对唐文化的共识。元朝的大统一,为国内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相互间的了解和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西藏、云南等边疆地区也进一步增加了与内地的往来。

此外,北方游牧民族在历史上还出现过诸多杰出的文人和科学家,他们不仅是本民族的佼佼者,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具有崇高的地位,如北魏东都洛阳城的规划者鲜卑建筑家宇文恺,金末元初的中原文豪鲜

卑人元好问,元代蒙古族药膳学家忽思慧,元朝蒙古族文学家杨景贤,清代著名蒙古族天文学家、数学家“卡特兰数”的发明者明安图等等^⑮,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很多的贡献。

第三,在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发展方面,北方草原民族的历史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翻开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至少在近代之前,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发展,主要是在黄河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共同影响下发生的。从商周王朝与鬼方、玁狁的战争到春秋战国诸侯和北狄诸族的关系,从秦国联合西戎到汉朝抵御匈奴,从“五胡十六国”到北魏六镇起义、唐代安史之乱,从辽宋、宋金西夏的对峙到元朝的大统一,从明蒙关系到清朝入主中原,始终伴随着黄河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碰撞曾带来战争和割据(如辽宋、宋金西夏),也促成空前的统一(如元朝),而每一次碰撞都为中华民族的融合、中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历史证明,中国古代历史的主脉,正是在两种文化的对话中前进的。

最后,草原民族对古代中华文明的传播,对西亚、欧洲科技文化的引进,对中华文明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著名的中西商路——丝绸之路的出现,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文献和考古资料看,这条最初以贩运中原丝绸为主的商路,最迟在公元前5世纪时就已形成。1929年,考古学家在中亚阿尔泰山北麓发掘的公元前6—4世纪的“巴泽雷克墓”中,发现了产自中国的漆器、铜镜、丝绸等葬品^⑯;20世纪中后期,德国学者在斯图加特发掘了一座2500年前的古墓,出土了中国丝绸残片^⑰。而以《史记》为代表的汉文史料表明,在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年、121年)之前,中原人士,至少是官方的地理知识基本上限于葱岭两麓地区。因而最早向西亚、欧洲贩卖中原商品者,很可能是北方游牧民族。例如,春秋时代的游牧民族大月氏在中原被人们称为“禺氏”,即贩卖(西域)玉石的民族;而在古代的欧

洲,他们却被称为“绢的民族”,即贩卖丝绸的民族^⑩。由此可以看出,大月氏人在春秋时代中西交流和丝绸之路的开辟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清晰的。其后,匈奴、鲜卑、柔然、吐谷浑、突厥、回纥、契丹、蒙古等民族都曾为开拓和控制丝绸之路付出过努力。如公元8世纪的突厥汗国为了控制东西商路,曾与罗马帝国联合,试图消灭波斯王朝,取代其中间商的地位,于是引发了长达25年的罗马与波斯之间的战争^⑪;同样,13世纪初叶,大蒙古国与花剌子模国之间的战争,起因也是为了垄断亚欧商路。

13-14世纪,蒙古四大汗国的建立,使亚洲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时人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⑫。和平的环境、发达的交通,使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阿拉伯的天文学知识和天文仪器、医学、数学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中国人使用阿拉伯数字始于元代;据1272年统计,仅回回司天台就申报该台有经书242种;郭守敬在编制《授时历》时,采用了从阿拉伯世界传入的数学知识,特别是球面三角知识;阿拉伯的医学对中国的医药学也有一定的影响,明朝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就吸收了阿拉伯的药物和治疗方法。也是在元代,部分欧洲的天文学、数学、文学流入中国,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的著名学者托勒密的《天文大集》被译为《麦者司的造司天仪式》,欧几里得几何学也同时传入中国。而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正是在元代传入欧洲的,其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大范围的游动生产、对商业往来的紧迫需求和历史上的频繁战争,促使北方草原民族处于永恒的游动之中,客观上使之成为古代中西信息传播的媒介、科学文化交流的纽带之一和古代欧亚大陆的“沙丁鱼”——激活因素。大月氏民族、匈奴民族、突厥民族、契丹民族的南进和西迁,蒙古族的征服战争,虽然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战火和血腥,但

也曾为中华文明的进步、世界文明的演进带来过激情和活力,由此而促成的民族大迁徙、腐朽王朝的加速灭亡,为各地区、各民族的交流和不同经济文化的融合创造了条件,他们的历史成就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同时也为中华文化在欧亚大陆的传播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北方草原文化是拥有活力的文化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文化被淘汰,而新的文化在不断诞生。客观地讲,北方草原文化作为特定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古老文化,与其他类型的文化相比较,其特质是鲜明的,既有传统、保守、落后的一面,又有进取、开放、积极的一面。因为她毕竟是数千年人类智慧的积淀,不但在历史上发出过耀眼的光辉,在今天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仍然展示着顽强的生命力,其中的优秀成分对当代的社会发展具有不容置疑的启迪和借鉴价值。

首先,北方草原文化是有数千年历史传承的文化。自北方草原文化在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域诞生,在无数次沧海桑田的历史巨变中,经受了来自自然的挑战和社会的洗礼,各族人民通过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顺应时代的需要,提高生产力,调整内部的社会结构,协调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与自然界的的关系,与世界的发展基本保持着同步。这一点我们从近现代蒙古民族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到答案。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加深,蒙古民族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压迫,传统经济崩溃。但是,蒙古民族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而是反思历史,审时度势,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对代表封建文化的佛教进行批判,进而对封建制度本身进行了否定,最终在东方弱小民族中首先选择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这一历史进程的完成,与马克思主义科学思

想的号召力有关,与周边先进民族的影响有联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与蒙古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正视历史、百折不挠、勇于进取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有着密切关系。这些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带有鲜明草原文化特色的价值观、历史观,曾使草原民族在种种艰难险阻面前获得了与时代同步发展的精神动力。

其次,草原文化是开放型文化。其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和博采众长两个方面。

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凡是与北方草原民族有联系的封建朝代,往往是思想文化最活跃的朝代,如北朝时期、唐代、五代十国时期、辽代和元代。除极少数统治者有极端行为之外(如北魏太武帝灭佛等),绝大多数统治者对外来文化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辽代的南北官制度,不仅是政治、经济政策,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政策;成吉思汗提出的所有宗教信仰平等的法律,在13世纪的欧亚大陆恐怕是绝无仅有文化政策;元朝的都城大都和上都,既建有孔庙、道观、佛寺,还建有天主教堂、聂斯托利教堂、清真寺。元朝的政府官员中既有儒士、道教信徒、佛教徒,也有伊斯兰教徒、天主教徒、聂斯托利教徒和萨满教徒,如此文化现象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在目睹杭州城内多民族聚居、多种文化相融的状况后,感慨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④。

博采众长、不断借鉴和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以弥补自身的缺陷,这一文化取向在北方草原文化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匈奴民族向中亚民族学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铜器工艺;回鹘民族借鉴粟特字母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党项民族、契丹民族借鉴汉文字创制了西夏文字和契丹大字;蒙古族综合了中原的火药制作和阿拉伯人的物理学知识,组建了世界第一支炮兵部队。蒙古族还翻译了大量中原儒家经典著作、史学著作、文学著作,从藏语翻译了《大藏经》、《格萨尔》等宗教、文学作品,丰富了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我们从北方游牧民族

历史中很少看到固步自封的保守行为。时至今日,开放的思想依旧在蒙古民族中得到传承和发扬。

第三,草原文化是古老的生态文化。300 年来的工业化使全球经济获得了以往数千年无法匹敌的发展,但是,在繁荣背后所出现的能源的巨大耗费、生态的急剧恶化,迫使人们反思现代文化的代价直至人类的命运,并对现代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产生忧虑,开始寻找人与环境、经济发展与环境相协调的出路。与此同时,全球的学者们几乎同时注意到北方草原文化事实上恰恰是人类史上最古老的生态文化,于是其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开始凸现。

特殊的生态环境,使先民们选择了“居无常所,逐水草而进”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游牧生产是严酷的,它是人类妥协于自然力的结果;但游牧生产又是理性的,它是顺应自然的选择;游牧生产还是人类自我牺牲精神的一种体现,它是古朴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

蒙古民族作为北方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在他们身上凝聚着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态观。在日常生活中,牧人们不会因为个人的利益或生活方便而破坏自然。蒙古包支架选择的是树木的枝干,覆盖包体的是家畜绒毛擀成的毡子。从生态角度看,蒙古包是人类长久性住宅建筑中用材最少、建筑方式对自然破坏性最小的建筑;牧人取暖和炊事的燃料,是牛羊粪和枯树枝,禁止砍伐树木;他们严禁在河水、湖水中洗涤污物、便溺。牧人们对自然充满感激之情,讴歌自然是蒙古族民歌的主题之一,人们把大地比作母亲,把草原比作摇篮,把河水比作乳汁……谚语中道:“苍天就是牧民眼里的活佛,草原就是牧民心中的母亲。”因此,他们将保护大自然视为自己的使命。在一首名为《十三匹骏马》的民歌中,有这样一段歌词:“牧人爱宇宙,宇宙赐给我们幸福;牧人保护宇宙,苍天交给我们的任务。”^②蒙古族拥有 300 余部英雄史诗,而英雄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保护草原生态。

在生产活动中,牧人们为了防止草场过度使用,将可利用草原划分

为四季营盘,不避严寒酷暑频繁倒场,以尽量减少对原生态的破坏,用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人为的痕迹和局部沙化进行修补。

牧人们对生态的保护思想是理性的。我们在蒙古族历史上可以看到十分丰富的、上升到自觉高度的生态观——依法保护生态的思想。从习惯法时代开始,蒙古族就已形成了保护自然资源的法律,严禁挖掘草地、遗火、春夏季狩猎和污染水源等行为^②。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在他的著作《史集》中曾记载了10世纪蒙古人因为保护草场植被而引发残酷战争的史实。元代以后形成的所有成文法几乎都涉及了生态问题,对蓄意破坏草场(如纵火)、盗猎行为制定了严厉的制裁法规,一些法规(如《元典章》、《阿勒坦汗法典》、《喀尔喀法典》)中还列出了保护动物名单。

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是围绕着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存与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资源的利用手段和方式、资源的占有分配方式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当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就是为了理性处理社会发展与科学合理利用资源的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讲,北方草原文化是人类在特定认知水平下,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佳选择。历史在发展,北方草原文化的外在形式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但蕴含于其中的保护利用资源的思想理念却是永恒的。

漫漫数千年,北方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共同缔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内涵,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 释:

- ① 方修琦:《从农业气候条件看我国北方原始农业的衰落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中国环境资源网,2004年6月6日。
- ② ⑤ 赵芳志:《草原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 ③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⑥ 王大方:《内蒙古自治区的重大考古综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 ⑦ 汪应梁:《中国民族史(上)》,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 ⑧ 田广金、郭素新:《北方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长城文化网。
- ⑨ B.沃耳科夫、A.诺芙哥多娃:《苏蒙历史文化考察队》,考古学参考资料(1),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 ⑩ 高峰:《考古揭示伊犁河谷人类文化变迁》,新华网新疆频道,2004年2月28日。
- ⑪ ⑫ 林干:《匈奴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 ⑬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
- ⑭ 阿岩、乌恩:《蒙古族经济发展史》,远方出版社,1999年版。
- ⑮ 张碧波、董国尧:《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专题文化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⑯ 乔治·比尔撰:《从一座凯尔特墓里出土的瑰宝》,编译参考,1980年第8期。
- ⑰ 王治来:《中亚史(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 ⑱ 张志尧:《草原丝绸之路与中西文明》,乌鲁木齐新疆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
- ⑲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 ⑳ 王礼:《麟园前集》。
- ㉑ 格鲁塞:《草原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㉒ 乌恩:《蒙古族传统美德》,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
- ㉓ 奇格:《蒙古法制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